

# 农村女性劳动力就近转移 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王弘钰<sup>1</sup>, 崔宏静<sup>1</sup>, 周宏<sup>2</sup>

(1. 吉林大学商学院; 2. 中国石油吉林石化公司, 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本文基于 626 份农村女性劳动力问卷调查, 利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 分析了农村女性劳动力就近转移的影响因素。研究首次发现打工经历、家庭成员的意见对农村女性劳动力就近转移具有正向影响, 而家庭中是否有需要照料的老人对其具有负向影响, 研究还得出与以往学者不同的结论, 即教育程度对农村女性劳动力就近转移具有负向的影响, 而年龄、婚姻、家中是否有儿童或少年、家庭年收入对其影响不显著, 研究还验证了非农技能、耕地面积、乡镇企业及个体私营企业数、所处地区差异对就近转移的影响。

【关键词】农村女性劳动力 就近转移 影响因素 Logistic 模型

【中图分类号】F241.2 【文献标识码】A doi: 10.3969/j.issn.1004-129X.2013.06.010

【文章编号】1004-129X(2013)06-0070-09

【收稿日期】2013-07-1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农民工雇佣歧视及其反生产行为研究(12BGL056);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中国新生代农民工收入状况与消费行为研究(12JZD028);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我国企业劳动关系和谐指数构建与应用研究(12AJY00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媒体类网络公司社会责任研究(10BGL005); 吉林大学 2011 年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种子基金项目: 劳务派遣工的组织公平对工作绩效影响机制研究

【作者简介】王弘钰(1965-), 女, 吉林长春人, 管理学博士, 吉林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崔宏静(1987-), 女, 河北承德人, 吉林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  
周宏(1958-), 男, 安徽当涂人, 中国石油吉林石化公司总经理助理、高级经济师。

## 一、问题提出与现有研究

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对我国城市化的协调发展和良性运行具有重大的促进作用。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2008)主要数据公报显示, 在外出务工的剩余劳动力中, 女性占 36%。流动人口中女性劳动力的增长速度要远远高于男性,<sup>[1]</sup>农村女性已经成为农村中潜在和现实剩余劳动力的主要部分。<sup>[2]</sup>

异地转移与就近转移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两种重要途径。异地转移即农村劳动力通过自发转移或经亲朋好友介绍, 向异地的大中型城市、小城市(镇)及境外等产业聚集能力较强的地区转移。<sup>[3]</sup>就近转移则指农村劳动力从传统的农业生产领域就近就地向非农业生产领域转移, 即通过调



整农业结构、发展乡镇企业、民营企业等,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县域范围内的非农就业。对于农村女性而言,由于社会、家庭以及自身因素的影响,使得她们的转移决策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因为作为剩余劳动力主要构成部分的农村女性还是农业生产的主力军,就发展中国家农村女性对经济贡献的实地研究表明,农村女性劳动力是粮食生产的主体力量,<sup>[4]</sup>她们在农业生产经验管理、教育培养子女、赡养老人、从事家务活动方面均发挥着主要作用。因此,异地转移与农村女性的其他职能间难免产生矛盾,造成了土地的搁置抛荒、留守儿童与老人缺乏照顾、流动人员与配偶长期分离等一系列问题。<sup>[5]</sup>

就近转移是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一个主要途径,而且将会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渠道。<sup>[6]</sup>温家宝总理在 2011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十二五期间要促进农民就地就近转移就业。当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近转移有其进行的必然性,一方面,劳动力进入城市的无序性和非理性,致使城市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不足,给城市管理带来巨大压力;另一方面,就近转移可以避免或减少异地转移造成的诸多负面影响,减少土地资源的浪费,解决因“外出”和“留守”而产生的农村家庭问题。同时,就近转移拥有足够的发展空间和机会来促进劳动力转移,例如通过挖掘农业产业内部就业潜力、促进农村土地的良性流转、发展县域经济和乡镇企业,这些途径保证了就近转移在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上的可能性。而在农业生产自动化、机械化不断发展的今天,农村女性一方面作为农业生产主体、<sup>[7]</sup>儿童和老人的主要看护者,承担着农村内部生产生活的主要责任,另一方面她们又是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主要构成部分,拥有大量的农闲时间。这种闲暇的长期持续,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整个农村家庭的边际收益,不利于农村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在这样的条件下,对于农村女性而言,就近转移无疑是她们最佳的非农就业选择。

当前,关于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的研究并不少见,学者的研究多集中在农村女性非农就业对城镇化进程、农业生产、子女成长的影响,<sup>[8-9]</sup>农村女性在转移过程中所处的弱势地位和根源的分析<sup>[10-11]</sup>等方面。其中,很多学者将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因素作为重点进行深入研究。吴宏洛(2006)的研究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对妇女外出流动有正向影响;<sup>[12]</sup>宋瑜(2008)的研究证明了社会关系仍然是农村女性劳动力参与流动的主要渠道;<sup>[1]</sup>地区差异对农村女性非农就业去向也具有一定的影响。<sup>[13]</sup>这些研究大都是针对农村女性的异地转移而进行的,并没能进一步发现就近转移对于农村女性劳动力的重要意义。然而,农村女性的就近转移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其因素类型与农村女性异地转移的影响因素有怎样的区别?应该从哪些角度为农村女性的就近转移提出政策建议,以促进农村女性的非农就业,从而有利于我国劳动力转移的良好运作和快速发展?目前,对这些迫切需要关注的问题,在现有文献中还没有找到答案。

鉴于此,本文利用 Logistic 建立农村女性劳动力就近转移的影响因素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并根据影响因素的不同,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以促进农村女性劳动力实现更为合理、有效的转移。

## 二、基本模型与变量说明

农村女性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决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会受到来自不同层面的因素的影响。以 G.H.Elder 为代表的生命历程理论通过时间维度把生命的个体意义同社会意义联系起来。其核心原理之一指出,出生于不同年代的个体会受到不同社会环境与历史时代的作用影响,从而会使得个体拥有的社会机会、受到的社会限制不同。生命历程理论更加关注整个生命历程中年龄的社会意义。<sup>[14]</sup>这种在生命时间、社会时间和历史时间等多重时间维度内研究个体发展的理论指导下,年龄对于农村女性就近转移的影响便应列入研究的检验范围之内。另外,在生命历程视角下,婚姻是人们人生历程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因此在关于农村女性的研究中,很多学者将婚姻状况纳入到其非农就业的研究中来。舒尔茨在《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中,将人力资本理论引入对农业生产的分析,认为人力资本在

农业生产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要远大于其他物质资本。<sup>[15]</sup>后续研究者逐渐将人力资本投资的意义引入劳动力转移分析领域,研究教育、技能对于劳动力转移的作用大小。因此对于农村女性就近转移的研究,也不能忽略对这两项因素的检验。

劳动者个人的就业行为不仅受到其自身人力资本禀赋的影响,还会受到家庭结构因素的影响。<sup>[16-17]</sup>尤其是对于农村女性,其作为抚养孩子、赡养老人、从事家务劳动的主要人员,家庭结构对其转移决策的影响可能会更为明显。家庭经济学(family economics)认为,家庭内的资源应该根据家庭成员的比较或相对效率来分配到各种活动当中。家庭内部,每个家庭成员都会具有某种比较优势,在市场上具有比较优势的人应该完全参与市场,在家庭中具有比较优势的人则应留在家庭中,从事家务劳动。<sup>[18]</sup>有许多研究表明,农村女性的非农就业决策同家庭利益最大化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家庭耕地面积、家中是否有儿童或少年、家中是否有需要赡养的老人、家庭年收入、家庭成员对农村女性就近转移的意见等因素很可能会影响农村女性个体的就近转移行为。

“新古典农户经济学理论”指出,农户是以追求家庭整体效用最大化为目标的特殊经济组织,<sup>[19]</sup>农户中家庭成员的农业生产和非农劳动以及消费需求之间存在着互为影响的联动关系,农户家庭成员的农业生产和非农劳动具有“不可分性”。现有学者的研究已经证明了中国农户劳动力在农业生产与非农劳动中存在明显的“不可分性”。<sup>[20]</sup>而这种“不可分性”就决定了在进行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研究的过程中不能笼统地将其全部划入异地转移的视角下,忽视农村女性“农业生产”与“非农就业”的不可分性,拉断两者间必有的联动关系。从这一角度来看,家庭所在地区的乡镇企业数目则极为可能利于维持这种“不可分性”,并为农村女性的就近转移提供更多的机会。

表 1 Logistic 模型中自变量的定义及赋值

变量	取值说明	注释
X <sub>1</sub>	1 为 16~19 岁 2 为 20~30 岁 3 为 31~40 岁 4 为 41~50 岁 5 为 50~55 岁	年龄
X <sub>2</sub>	1 为小学以下 2 为小学 3 为初中 4 为高中 5 为中专 6 为大专及以上学历	文化程度
X <sub>3</sub>	1 为有技能 0 为无技能	非农技能
X <sub>4</sub>	1 已婚 0 为未婚	婚姻状况
X <sub>5</sub>	1 为有 0 为没有	异地打工经历
X <sub>6</sub>	1 为愿意 0 为不愿意	非农就业意愿
X <sub>7</sub>	1 为 5 亩或更少 2 为 6~10 亩 3 为 11~15 亩 4 为 16 亩及其以上	家庭耕地面积
X <sub>8</sub>	1 为有 0 没有	家中是否有儿童或少年
X <sub>9</sub>	1 为有 0 为没有 ;	家中是否有需照料的老人
X <sub>10</sub>	1 为 5000 元以下 2 为 5000~10000 元 3 为 10000~20000 元 4 为 20000~30000 元 5 为 30000~40000 元 6 为 40000~50000 元 7 为 50000~80000 元 ; 8 为 80000 元以上	家庭年收入
X <sub>11</sub>	0 为不支持 ;1 为中立 2 为支持	家庭成员意见
X <sub>12</sub>	1 为几乎没有 2 为有几家 3 为有很多	乡镇企业或个体私营企业
D <sub>1</sub>	1 为河北南部地区 0 为其他地区	地区虚拟变量 1
D <sub>2</sub>	1 为河北中部地区 0 为其他地区	地区虚拟变量 2

注: 非农技能是指在农业生产以外具有例如手工艺、纺织技术、餐饮经营能力及厨艺等。异地打工经历是指是否有到本县或本区以外的地区打工的经历,即异地转移经历。家中是否有儿童或少年,是指是否有学龄前儿童、需频繁照料的学龄儿童和中小学少年。家中是否有需照料的老人,是指家中是否有生活已经不能自行料理,需他人频繁照料的老人。



根据上述理论思考,本文将影响农村女性就近转移的主要因素归纳为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和地区因素。采用 Logistic 模型,将农村女性劳动力是否实现就近转移作为几率,而将农村女性的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和地区因素作为影响几率因素,以揭示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在 Logistic 模型中,以农村女性劳动力的就近转移状况为因变量。自变量有个人因素中的年龄、文化程度、非农技能、婚姻状况、打工经历、非农就业意愿,家庭因素中的耕地数量、儿童或少年、需要照顾的老人、家庭年收入、家庭成员的意见,地区因素中的区域特征和地区中的乡镇企业、个体私营企业数量。构建的模型为:

$$\ln\left(\frac{p}{1-p}\right)=\text{constant}+\alpha_1X_1+\alpha_2X_2+\alpha_3X_3+\alpha_4X_4+\alpha_5X_5+\alpha_6X_6+\alpha_7X_7+\alpha_8X_8+\alpha_9X_9+\alpha_{10}X_{10}+\alpha_{11}X_{11}+\alpha_{12}X_{12}+\alpha_{13}D_1+\alpha_{14}D_2$$

因变量的具体定义和赋值:  $p$  就近转移的概率,为因变量,由就近转移与未转移比率计算所得,其中用“1”代表实现就近转移,用“0”代表没有实现就近转移。

自变量的具体定义及赋值如表 1 所示。其中,  $X_{12}$  指乡镇企业或个体私营企业数,地区虚拟变量 1 和地区虚拟变量 2 结合起来的取值代表了三个地区,即:当  $D_1=1, D_2=0$  时,为河北省南部地区,  $D_1=0, D_2=1$  时,为河北省中部地区,而当  $D_1=0, D_2=0$  时,为河北省北部地区。

### 三、样本的统计特征描述

本研究利用方便抽样的方法,在 2011 年 5 月至 10 月对河北省北部的承德市和张家口市,中部的保定市与石家庄市,南部的邢台市和邯郸市的 19 个村庄进行了实地调研。深度访谈 56 人,其中北部地区 18 人,占 32.1%;中部地区 17 人,占 30.4%;南部地区 21 人,占 37.5%。受访者均是农村家庭中除正在接受高等教育以外的女性劳动力。调查共发放问卷 700 份,回收 663 份,有效问卷 626 份,有效率为 94.4%。在有效问卷中,河北省北部地区 260 份,占 41.5%;河北省中部地区 164 份,占 26.2%;河北省南部地区 202 份,占 32.3%。

表 2 显示了实现就近转移的农村女性与没有实现就近转移的女性在各类因素上的频数分布与所占频率。其中,个人因素中,年龄一项上,实现转移者中 31~40 岁的人数最多,其次为 21~30 岁,所占比例分别为 25.8%和 24.6%,值得注意的是 51~55 岁的农村女性在实现转移的总数中占有 24.2%的比例。而在未实现转移的农村女性中,51~55 岁的人数最多,占比达 31.8%;同时,实现转移者的年龄均值要小于未实现转移者,前者均值为 34.98 岁,后者为 37.81 岁;在文化程度一项上,实现转移者的受教育年限略高于未实现转移者,前者为 8.48 年,后者为 8.30 年,文化程度在两组中的分布情况差异不大,最高比例都出现在初中文化水平上,分别为 48.1%和 45.3%;对于技能的有无,实现转移组拥有技能者占有 35.6%的比例,而在未实现转移组,有技能者只占有 21%的比例;打工经历一项在实现就近转移的农村女性中所占比例为 70.1%,而在未实现转移组中占比 43.1%。在婚姻状况、就近转移意愿两项因素上,两组农村女性间的频率分布相似,差异非常小。在家庭因素方面,实现就近转移的农村女性,其家庭收入的均值要大于没有实现就近转移的农村女性,前者为 36 502.89 元,后者为 31 997.48 元,具体频率分布情况表现为在实现转移组,3 万~5 万组所占比例最高,为 37.9%,而在未实现转移组中,1 万~3 万组占比最高,为 39.3%;在家庭成员的支持情况上,实现转移组明显获得更多的家庭支持,支持比例为 87.9%,而未转移组,支持率仅为 44.2%,差异非常显著;在儿童少年一项上,转移组家中有儿童或少年的比例大于未转移组,有儿童或少年的比例分别为 56.8%和 47.2%;但对于耕地面积和家中是否有需照料的老人两项因素上,实现转移组和未转移组的差异并不大。另外,在地区因素上,乡镇企业数量在转移组和未转移组间的差异很大,其中,实现转移组中,农村女性所在地几乎没有乡镇企业的比重只有 7.6%,但在未实现转移组,这个比重达到了 23.5%,而且,前者有

多家乡镇企业的比重达到 51.9%，后者仅为 28.7%，两组农村女性在此项因素上的分布差异十分显著。

表 2 有无实现就近转移的农村女性劳动力在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和地区因素方面的比较

	实现就近转移 (264 人)		未实现就近转移 (362 人)			实现就近转移 (264 人)		未实现就近转移 (362 人)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年龄(岁)					文化程度				
16~20	8	3.0	21	5.8	小学以下	28	10.6	50	6.1
21~30	65	24.6	62	17.1	小学	56	21.2	82	17.1
31~40	68	25.8	74	20.4	初中	127	48.1	164	20.4
41~50	59	22.3	90	24.9	高中或中专	51	19.3	58	24.9
51~55	64	24.2	115	31.8	大专及以上学历	2	0.8	8	31.5
技能					婚姻状况				
有技能	94	35.6	76	21.0	已婚	163	61.7	238	65.7
无技能	170	64.4	286	79.0	未婚	101	38.3	124	34.3
是否有打工经历					就近转移意愿				
有	185	70.1	156	43.1	有	211	79.9	283	78.2
无	79	29.9	206	56.9	无	53	20.1	79	21.8
耕地面积					家庭收入				
5 亩或更少	115	43.6	167	46.1	1 万及以下	22	8.3	61	16.9
6 亩~10 亩	98	37.1	94	26.0	1 万~3 万	92	34.9	142	39.3
11 亩~15 亩	30	11.4	47	13.0	3 万~5 万	100	37.9	109	30.1
16 亩或更多	21	7.9	54	14.9	5 万~8 万	32	12.1	39	10.8
儿童少年					8 万及以上	18	6.8	11	3.0
有	150	56.8	171	47.2	老人				
没有	114	43.2	191	52.8	有	103	39.0	160	44.2
家庭成员意见					没有	161	61.0	362	55.8
反对	10	3.8	128	35.4	乡镇企业数量	20	7.6	85	23.5
中立	22	8.3	74	20.4	几乎没有	107	40.5	173	47.8
支持	232	87.9	160	44.2	有几家	137	51.9	104	28.7
样本规模(人数)					626 人				

#### 四、实证结果与结论

##### (一)实证结果

利用 Logistic 模型对于农村女性劳动力就近转移发生的概率进行分析。从表 3 显示的结果可知模型拟合度是显著的,回归方程成立。通过模型可知,对于农村女性劳动力是否从事非农就业,所检验变量总的预测正确率为 74.1%。显然,从正确分类率来看,模型较为理想。采用 5%作为显著水平,农村女性劳动力就近转移受如下因素的影响(见表 3)。

在个人因素中,受教育程度对就近转移概率具有负向影响,负向影响在 0.05 的水平上显著;非农技能对非农就业概率具有正向影响,正向影响在 0.01 水平上显著;外出打工经历对就近转移概率具



有正向影响,正向影响在 0.01 的水平上显著,年龄、婚姻状况和个人就近转移的意愿对就近转移的作用不显著。家庭因素中,家中有需照料的老人对就近转移的概率有负向影响,负向影响在 0.01 的水平上显著,家庭成员意见对就近转移的概率具有正向影响,正向影响在 0.01 的水平上显著,家庭耕地面积、家中是否有儿童或少年及家庭年收入对就近转移的影响不显著。地区因素中,所在地区乡镇企业或个体私营企业的数量对就近转移概率具有正向影响,正向影响在 0.01 的水平上显著,两个地区虚拟变量对非农就业概率均具有负向影响,负向影响在 0.01 的水平上显著。

(二)结论

首先,研究首次发现打工经历和家庭成员的意见对农村女性就近转移有正向影响,而家庭中是否有需要照料的老人对其具有负向影响。

拥有外出打工经历的人相比于没有外出打工经历的人,更愿意进行就近转移。以往的研究中并没有对这项因素的作用进行验证,但经深度访谈得知,这主要是源于以下两个原因:一是就农村女性整体而言,文化水平不高、拥有技能的人数不多,这使得她们外出打工时所从事的均是一些比较繁重的体力活,例如参加建筑队、餐饮部门后厨的清洁等。这些工作的特点是劳动时间长、时间限制特别严格,这些特点对于长期从事自由的农业生产的农村女性而言,工作的方式和强度很难适应。二是农村女性一旦外出,很有可能会面对耕地抛荒、儿童老人得不到很好照料的问题,有过外出经历的人对此深有体会。基于上述这两个原因,她们更加愿意在农闲之余参与比较灵活方便的就近转移。

表 3 Logistic 模型回归分析结果

	B	Wald	Sig.
<b>个人因素</b>			
年龄	0.124	1.331	0.249
教育程度	-0.268	4.881	0.027
非农技能	0.802	8.939	0.003
婚姻状况	0.326	1.394	0.238
打工经历	0.707	8.840	0.003
非农就业意愿	0.065	0.058	0.810
<b>家庭因素</b>			
家庭耕地面积	0.020	0.029	0.865
儿童和少年	0.310	1.947	0.163
需照料的老人	-0.715	10.291	0.001
家庭年收入	0.045	0.488	0.485
家庭成员意见	1.565	80.700	0.000
<b>地区因素</b>			
乡镇企业或个体私营企业	1.258	38.713	0.000
地区虚拟变量 1	-0.847	6.980	0.008
地区虚拟变量 2	-1.405	12.590	0.000
常数项	-7.015	50.238	0.000
Chi-square	255.573	df 14	sig. 0.000
确定系数的 R <sup>2</sup>		0.335	
调整后的 R <sup>2</sup>		0.451	
Overall Percentage		74.1	

家庭成员越支持,农村女性越容易就近转移。这说明了农村女性是以家庭整体利益为依据来决策自己的就业选择的。调查结果显示,62.6%的被调查者的家庭成员支持她们在非农季节就近转移,22.0%的被调查者的家庭成员反对其就近转移。经实地考察本文发现反对农村女性就近转移的原因主要是生活水平的提高,让家庭成员觉得女性没必要再非农就业。

如果家中有需要照料的老人,则农村女性一般不能就近转移。文章中“需要照料的老人”是指那些已经没有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的老年人。在农村由于没有养老院、敬老院这类机构,因此照料这些老人的责任都由农村家庭中的女性来承担,这是她们没有机会进行就近转移的主要原因。

其次,研究得出与以往学者不同的结论。

受教育程度对就近转移概率具有负向影响。这表明,农村女性的受教育程度越高越不会选择就近转移。这与以往学者得出的结果不同。以往学者一般认为受教育程度对女性的非农就业有正向影响。<sup>[13]</sup>但经调查可知,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村女性多集中在年轻一代女性中,这些人整体来说视野比较开阔、对城市生活的了解也较多,因此她们更加倾向于进城务工,去体验城市生活;而文化程度较低的农村女性则更愿意选择就近转移,因为对于她们而言,就近转移的风险小,转移后心理所承受的不适也更小。这也同时验证了就近转移成本低于异地转移成本的结论。

年龄、婚姻状况对就近转移的作用不显著。说明这两个因素的差异没有对农村女性的就近转移造成影响。而以往的研究认为年龄和婚姻状况对农村女性非农就业有负向的影响。<sup>[12]</sup>之所以结论不同,本研究认为就近转移,距离家庭比较近,就近从事非农劳动比较方便,不会出现因为年龄大而造成的转移困难,也并不会耽误已婚女性照顾家庭,因此使得年龄较高者和已婚者都有机会实现就近非农就业。

家中是否有儿童或少年及家庭年收入对就近转移的影响不显著。吴宏洛认为家庭有学龄前儿童的女性其非农就业的机会更少,在本研究进行之初,通过访谈得知,学龄儿童和少年同样可能是影响农村女性转移的因素,因此本研究检验了儿童或少年的影响。之所以结论不同,本研究认为因为现在农村中包括幼儿园在内的教育机构发展迅速,就近转移并不会限制母亲在孩子的课余时间照顾他们,而且家中有劳动能力的老人可以分担照看孩子的责任,所以家中是否有儿童或少年这一因素的作用也并不显著。另外,调查显示,农村女性就近转移的目的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打发闲散时间,而经济水平不再是主要影响因素。

再次,研究验证了非农技能、耕地面积、乡镇企业及个体私营企业数、所处地区差异对就近转移的影响。

非农技能对就近转移概率具有正向影响,说明农村女性劳动力所拥有的非农技能越强,其就近转移的频率越高,这一结论与以往学者的研究一致。实地考察结果也显示,90%以上拥有非农技能的农村女性劳动力都会在农村季节从事非农劳动,其中,55.3%的人选择了就近转移。

家庭耕地面积对就近转移影响不显著。由于近年来农业生产的机械化、自动化水平不断提高,因此即便是耕地面积大,农业生产依旧可以比较顺利的进行,所以家庭耕地面积对农村女性就近转移影响不显著。

所在地区乡镇企业或个体私营企业的数量对就近转移概率具有正向影响。这说明所在地区乡镇企业或个体私营企业的数量越多,农村女性劳动力越容易就近转移。由于农村女性既是农业生产的主体,又是家庭责任的主要承担者,因此她们不能过远地脱离土地,而传统的“留守”观念又不容许她们离家太远,所以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企业的数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她们就近转移的可能性。

两个地区虚拟变量对非农就业概率均具有负向影响。说明相对于河北省南部和中部而言,河北省北部地区的农村女性更容易就近转移。其主要原因是受到地理气候的影响,河北省北部地区的农



业生产为一年一季,因此,相对于南部和中部地区,北部地区的农村女性有更长的农闲季节,所以她们对就近转移的要求也更为迫切。

以上各项结论表明,农村女性能否实现就近转移,更多地取决于农村妇女是否有能力、有条件找到工作,而非仅仅由农村妇女自身所能决定。农村女性的就近转移决策受到个人、家庭和地区因素的综合影响,一方面农村女性是否有技能是她们转移的关键,另一方面,地区乡镇企业或个体私营企业的数量是限制农村女性转移的重要因素,这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她们是否有条件找到工作。

## 五、对策建议

### (一)加快发展县域经济,发展劳动密集型乡镇企业

十二五规划明确指出,大力发展农村非农产业,壮大县域经济,促进农民就地就近转移是 2011 年国家重点工作内容之一。县域经济是城乡结合的经济,县域内的乡镇企业作为农村非农产业的主体对于吸纳农村劳动力的有着巨大的潜力。因此,加大对发展县域经济的支持力度,大力鼓励和发展乡镇企业,对于解决农村女性劳动力的就近转移问题,将势必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调研显示,尽管河北省部分地区乡镇企业和个人私营企业数目众多,仅石家庄市张家庄镇就有乡镇企业及个体私营企业 200 余家,但是这些企业规模都很小,对劳动力的吸附能力有限,因此,要解决农村女性的就近转移,还要加快劳动密集型乡镇企业的发展,扩大乡镇企业的规模,逐步实现规模经济,从而吸收更多的农村劳动力。

### (二)倡导发展自由灵活的行业,减少农村女性的转移成本

由于农村女性更适合在农闲季节从事一些自由灵活、有弹性的劳动,以保证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及对家庭的照料。所以,当前乡镇企业的发展还需要更多地考虑到农村女性的自有特点,开展更多适合并且有利于这一群体的行业,以实现她们对比较灵活自由的就业方式的需求。2011 年 4 月,全国妇女手工编织协会已经成立,政府应鼓励企业与各地的妇女手工编织协会合作,发展手工编织行业,利用其灵活的就业方式,促进农村女性就近就地转移。

### (三)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为农村女性提供与农业产业相关的技能培训

农业产业化是农业发展的根本出路,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可以拓宽传统农业的领域,延伸农业的产业链条,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农产品深加工行业,从而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由此,为农村女性劳动力提供的技能培训也要有针对性,要认识到这部分人不能过远的脱离土地,因此培训的技能应该更加注重与农业产业相结合,最终实现农村女性劳动力的产业内部消化。<sup>[21-22]</sup>例如,依据市场需求,为农村女性提供家禽、家畜养殖技能的相关培训,蔬菜、药材等劳动力密集程度较高的经济作物的种植培育技术等,利用这些技术来缩短农闲季节,逐步转变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

## 【参考文献】

- [1] 宋瑜. 农村女性劳动力流动及影响因素研究[D]. 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8: 77-78.
- [2] 楚向红. 河南省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问题的思考[J]. 学习论坛, 2007, 23(9): 51-53.
- [3] 杜鑫. 就地转移和异地转移劳动力的收入差距研究[J]. 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 2008: 121-135.
- [4] Boserup, E. Obstacles to Advancement of Women during Development [A]. Schultz, T.P. Investment in Women's Human Capital [C]. Chicago/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51-60.
- [5] 朱焕芝. 农村劳动力就近转移问题研究[J]. 经济研究导刊, 2010, (17): 41-42.
- [6] 李秀丽. 非农就业就近转移的经济意义分析——以广西凌云县新寨村为例[J]. 经济研究导刊, 2009, (10): 34-35.
- [7] 何军, 李庆, 张姝弛. 家庭性别分工与农业女性化——基于江苏 408 分样本家庭的实质分析[J]. 南京农业大学学





报, 2010, 10(1): 50-56.

- [ 8 ] 张原. 从“从男耕女织”到“男出女守”[Z].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劳动关系分会第3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 2010.
- [ 9 ] 刘靖. 非农就业, 母亲照料与儿童健康——来自中国乡村的证据[J]. 经济研究, 2008, (9): 136-149.
- [10] 刘妍. 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弱势及社会根源[J]. 江苏农村经济, 2009, (11): 74-75.
- [11] 侯俊香, 牛习昌. 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的障碍与出路[J]. 经济论坛, 2004, (2): 113-114.
- [12] 吴宏洛. 影响农村女性劳动力流动的因素分析——以福建省为例[J]. 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学报, 2006, (1): 40-45.
- [13] 刘妍, 脱继强. 江苏省农村已婚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人口科学, 2008, (2): 88-96.
- [14] 李强, 邓建伟, 晓箐. 社会变迁与个人发展: 生命历程研究的范式与方法[J]. 社会学研究, 1999, (6): 1-18.
- [15] Schultz, T. W.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The Role of Education and of Research[M]. New York: Free Press, 1971.
- [16] 陆文聪, 吴连翠. 兼业农民的非农就业行为及其性别差异[J]. 中国农村经济, 2011, (6): 51-62.
- [17] 彭荣胜. 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J]. 商业研究, 2009, (7): 183-185.
- [18] Becker, G. S. A Treatise on the Family[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19] Singh, I, Squire, L. and Strauss, J. A Survey of Agricultural Household Models: Recent Finding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J].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1986, 1(1): 149-179.
- [20] Bowlus, A. J. and Sicular, T. Moving toward Markets? Labor Allocation in Rural China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3, 71(2): 561-563.
- [21] 刘勇, 钟菊英. 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形成结构与转移战略研究[J]. 财经理论与实践, 2004, 25(131): 11-15.
- [22] 高吉俊, 姜会明. 吉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影响因素分析[J]. 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44(4): 109-113.

[责任编辑 李新伟]

## An Empirical Study on Factors Affecting Nearby Immigration of Rural Female

WANG Hong-yu<sup>1</sup>, CUI Hong-jing<sup>1</sup>, ZHOU Hong<sup>2</sup>

(1. Business School of Jilin University 2. Sinopec Jilin Corporation, Changchun Jilin, 130012,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with 626 persons in Hebei province, a logistic model is to build to analyze the personal, family and regional factors which affect the nearby immigration of rural female labor. The study finds that non-agricultural experience and family member's attitudes have the positive effect to female labors' nearby immigration for the first time, whether there are the elderly who need to take care in a family has the negative effect. In the mean time, the research gets the following different results from others: education has negative influence, ages, marital status, infants and teenagers and income have on influence. Our research also tests the former results about the impact of non-agricultural skills, arable land, the number of country companies and residence.

**Key Words:** rural female labor, nearby immigration, affecting factor, logistic model